

生命与创作

采写 傅光明

周涛：与自然的灵性对话

余光中：我把自己想像成『茱萸』的孩子

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

龙应台：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为读者而写

张抗抗：『作』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力

叶广岑：女人是感情型的人

李银河：性有可能是一件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

陈丹燕：虚构的东西可以给我提供比非虚构更大的空间

刘心武：作家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

铁凝：穿越了复杂之后的单纯，是我一直希望追求的境界

生命与创作

采写 傅光明

周涛 与自然的灵性对话

余光中 我把自己想像成“莱莫”的孩子

余秋雨 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

龙应台 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为读者而写

张抗抗 作 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力

叶广芩 女人是感情型的人

李银河 性有可能是一件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

陈丹燕 虚构的东西可以给我提供比非虚构更大的空间

刘心武 作家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

铁凝 穿越了复杂之后的单纯，是我一直希望追求的境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生命与创作: 中国作家访谈录 / 傅光明采写.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2
ISBN 7-80713-068-7

I. 生... II. 傅... III. 作家 - 访谈录 - 中国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4442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李海峰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8.25 印张 57 幅图 22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文学访谈——作家的口述史

(代序)

傅光明

口述历史 (Oral History) 现在已成了颇为流行的一个学术词语, 单这个词语而言, 它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内文斯 (Allan Nevins) 在1938年创意发明的。不过, 正如堪称现代最早搞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的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所说, 内文斯的功劳只在于发明了这个名词, 若就口述历史的传统来说, 不论中外, 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 只是当时没这么叫而已。另一位纯种的美国口述历史专家唐纳德·里奇, 在他那本《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 也开宗明义地说: “不同于中世纪流传的口碑故事, 人类首次有历史记载之时, 口述历史便出现了。三千年前, 在中国周朝便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的书记。”

事实上, 中国的口述史学传统真是源远流长。汉字的“古”, 即指十口相传, 意思是说古时候的事若非人们口口相传, 根本就保存不下来。像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以及燧人、有巢、神农、轩辕等诸华夏民族老祖宗的神话事迹, 都是这么留下来的。当然, 里面包含了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 恐怕永远也无从考证出来了。

由于十口相传, 人多嘴杂, 自然会出现口传的多样化或丰富性。同时, 对其内容是真实还是想像, 又难以得到印证。这就让后来的正史学家们得理不让人, 他们在没有找到物质性证据之前, 是决不相信口述传说的。

不过, 翻开中西方的早期文明史, 不论司马迁《史记》、左丘明《左传》的纪传、编年, 还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史籍, 写作时都大量使用了口述史料。《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尤其是列传七十篇, 历史被

司马迁写得如此鲜活。有趣的像《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王一段：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且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可见，司马迁为了让后人相信荆轲刺秦的真实性，他说是他亲耳听“公孙季功”和“董生”说的，而此二人是和夏无且大夫出去玩时，是这位秦始皇的私人医生，亲口告诉他俩说，荆轲刺秦时，他不仅就在现场，还用“药囊”打过荆轲。这段描述或许典型地昭示出，历史也许就是文史不分的二合一。再像那篇脍炙人口的历史散文《鸿门宴》，则更是一篇文学经典。因为，除了《史记》，没有其他的旁证可以考据出，“鸿门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自序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他还专章谈到史料的重要：“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

如此说来，文学访谈录其实也具有受访作家口述史的意味，而作为采访者，充当的就是“为史官搜集”作家言谈的“书记”。其文学的史料记载，或许能为后天的文学史者，在提供“一翔实透辟之叙述”的同时，烙

印下作家们不可多得的“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

对于面对面的访谈，我一向乐此不疲。我非常喜欢访谈这种富有亲和力的对谈形式，不正襟危坐当然更好。照我理解，访谈不同于市井茶馆的聊天闲扯，与亲朋密友间海阔天空的“摆龙门阵”也不搭界，它最好是有话题、带目的的精神、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文学访谈要做得深入就更为如此。因为它重在能使一个作家的个体生命，在文学时空的历史记忆里蚀刻下无法磨灭的“过去的声音”。

这里收录了笔者在两年时间里断续采写的对十位作家、学者的访谈录，他们每个人都在那已“过去的声音”里，留下了一隅只属于个人的多元、复杂、深邃的精神世界，至少那里流露的都是他们的真性情。透过它，或可以追踪周涛诗与散文里粗犷剽悍的“胡儿血性”，寻觅缪斯青睐的“乡愁”以外的余光中，拷问背负着“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的余秋雨，感受感情型作家女人叶广芩的细腻，领略张抗抗富有“作”欲的想像力，思考陈丹燕精神上对欧洲原乡的认知，欣赏龙应台阳刚的豪侠与母性的柔肠，赞佩李银河性学研究上孜孜不倦的学术执著，寻觅刘心武甘为文学边缘人的散淡心境，向往铁凝对追求穿越了复杂的单纯境界的那份痴迷。

最后，对他们每一位都能热情而真诚地接受我的采访，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4年10月20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文学访谈——作家的口述史（代序） 傅光明 /1

周 涛：与自然的灵性对话 /1

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 /19

余秋雨：老舍之死和他天真、纯净的思维有关 /49

余光中：我把自己想像成“茱萸”的孩子 /61

龙应台：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为读者而写 /83

张抗抗：“作”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力 /101

叶广岑：女人是感情型的人 /118

李银河：性有可能是一件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 /138

陈丹燕：虚构的东西可以给我提供比非虚构更大的空间 /157

刘心武：作家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 /189

铁 凝：穿越了复杂之后的单纯，是我一直希望追求的境界 /221

周涛：与自然的灵性对话

■ 被采访者：周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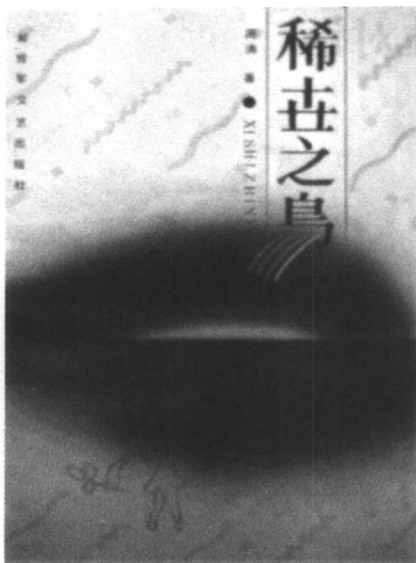
■ 采访时间：2002年8月28日

■ 采访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

傅光明：我想先跟您聊两个定位，第一个是您对自己人的定位，第二个是对自己散文的定位。文学圈里有人送您很多称谓，诸如“军旅文学三剑客”、“新边塞诗的扛旗人”、“新疆文学界的巨人”、“文化游记四大天王之一”、“文坛的翘楚”、“城市的心灵”，等等。还有好多人也许不纯粹是调侃地说，您已经成为写乌鲁木齐的新疆珍贵的土特产之一。面对一大堆空洞的光环，您有过哪怕瞬间的晕眩没有？我觉得那都是些单向的限定，干脆称谓您诗人最好。毕淑敏在《天山大侠周涛》一文开篇即称您是“喜马拉雅鹰的转世灵童”。那么您觉得自己是天山上的“稀世之鸟”呢？还是戈壁上的“荒原狼”？您怎么给自己一个客观的定位？

周 涛：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从来也没有老想着怎么定位。写过诗，但不一定是诗人。因为，写诗的时候是诗人，未必平时的生活当中时时处处老记着自己是诗人，平常生活当中应该是个普通人。我觉得这些称谓都是朋友们的一种错爱、抬爱，“转世灵童”咱担当不起，但人家是一片好意。我觉得，朋友们的抬爱作为文章表述出来，都有些夸张，总是要把这个人说得与众不同，才能表达自己那种友谊。实际上讲，普通人最合适。土特产也行，我确实有点像土特产。但客观地给自己定个位的话，我觉得新疆解放以后，我能算是在大规模的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文学导体。可能也还有别的导体，比如经济的、政治的，都有一些代表性人物。而我是两种文化大规模交融过程下的一个导体。

傅光明：第二就是想请您谈谈对自己散文的一个定位。徐志摩在他的



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里说，他思想文化的视野都是康桥胚胎、打开的。

周涛：康桥就是剑桥吧，我还不太懂。（笑）

傅光明：您来自西北，精神气质和血脉当中有许多都是西北的东西，您觉得自己的散文，从它的精神脉络、血液、肌理、灵性的东西来考察，是不是有很多是来自大西北的风情、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的特征？

周涛：那肯定，因为我九岁，小学三年级时，就到了新疆。跟我父

母去了以后，我就生活在那里。这么多年，南疆北疆都生活过，所受的文化熏染，除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以外，很大成份是西域的，是来自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种影响。维吾尔人的、哈萨克人的、回人、乌兹别克人的、塔吉克人的，或多或少都有影响。所以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西北胡儿”呢？从人种学上说，我填的民族成份是汉族，但从文化意义上说，从儒教思想上来说，我就是在血脉非常混杂的状态下形成的一个“化外之民”嘛。我的散文产生在这样一个地域和文学当中，不管是好还是坏，与内地的很多作家有很多不一样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包括表达方式，都是有区别的。有些人喜欢这种区别，有些人就排斥、讨厌这种区别。这种人生姿态和精神状态，容易引起某一类人的不高兴，我想也是很正常的吧，因为它是一种文化反差。

傅光明：有很多读者读您的散文感觉里边充盈着一种刚柔相济的美，阳刚气十足，有霸气、血气，甚至还有“匪气”，真正开拓了中国散文写作的新境界。我喜欢用“神气儿”这个词，您觉得自己的散文有一股什么气？

周 涛：什么霸气、匪气的，我都不反对。但我并没有感觉到我有那些气，自己就觉得有点灵气。

傅光明：也许是灵气成就霸气和血气。

周 涛：那些气读者说我有，我就得承认我有，是吧。可我自己却从没有刻意追求那种东西，这种气可能和环境有关，也许还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

傅光明：我们习惯上称作“气”的，有一种综合、复杂的、很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在里面。

周 涛：实际上，到了大西北，到了新疆，搞文学以来，我自己觉得还多少有一点灵气。剩下的那些气，我自己没有追求过。如果别人说有，我想是那块地域、水土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辐射到我身上，使我的作品里多少有一点。假如有那些气氛，我感到非常庆幸，尤其是匪气，其实我“不匪”。很儒雅是不是？还是比较温文尔雅吧。

傅光明：看上去跟贾平凹或余秋雨这样的朋友比起来，您好像是具有一点“匪气”。他们好像更有谦谦风度。我知道您和贾平凹是很好的朋友，但您在为人、性情和散文的风格上和贾先生是迥然相异的。您觉得您与贾平凹在散文写作上有哪些主要区别？

周 涛：我觉得平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非常钦佩他。可以说，他的文化里主要是风情、土地，西安的古老文化滋润了他，养育了他。同时他也有乡村的文化，土地的文化。他当过农民，种过地呀。地气很重要，他有地气。

傅光明：西北三秦的地气。

周 涛：如果没有真正在这个土地上生存过，劳动过，求生过，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你看我们这个中国文坛上，当然不是全部了，有几个农民出身的作家，真在家里种过地的，在农村生活过一二十年的？一旦他们的才气、眼界忽然间打开，那种蓬勃的才华往往是城市长大的人无法比拟的。我在想这个问题，凭什么他这么厉害。

傅光明：简单的说法就是他来源于地气。

周 涛：我觉得这是他和土地的关系，而我们的欠缺，恰好是在这里。我们比他们不缺乏聪明才智。学到的知识，看过的书，也不比他们少。最后我想了想，只缺一个条件，地气不够。

傅光明：如果用您自己的话说，是地气不够或者欠缺的话，您在另一个方面倒是很充足的。我觉得您的性情非常好，我读您的散文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颇有魏晋风骨，不管为人还是为文，能感觉到里面有一种狂狷之气。您对自己这种文中的品格也好，内在精神也罢，有没有一种自信、自查？

周 涛：我觉得人家老说我狂，我并不狂。我觉着很直率、不藏话，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憋着难受呀！交友不设防，为人不设防。谁坑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知道。如果有点狂狷的话，我还是赞成这种狂狷的，狂者进取啊，狷者有所不为，进取精神应当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状态。我不喜欢过于韬光养晦、城府很深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丧失人格。我觉得人要活得堂堂正正，站着活。有的人你看他成功了，但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人格的失败上，造成了一个虚假的成功。有的人失败了，但他的失败每一次都建立在自己的人格的事迹上，实际上是个假失败。我看阳光卫视的《杨澜访谈录》印象非常深，她访梁从诫时，梁从诫说：我们家三代都是失败者，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他敢于承认他们家三代都是失败者，其实他们三个人哪一个是失败者？都没有失败。

傅光明：他们的价值更多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实现着。

周 涛：我们提起这些人的时候，往往有高山仰止、肃然起敬之感。为什么呢？他们的人格，万金难买。有些人看起来，似乎取得了个什么头衔。但是你知道他是怎么取得的吗？背后藏着多少可耻的交换，实际上走向了失败。

傅光明：所以有些评论家在说到您的人品、文品时，喜欢用这样一个词，就是顶天立地军中一血性男儿。

周 涛：这话不敢当。

傅光明：我很喜欢您的《读〈古诗源〉记》，这好像是被很多读者忽

略掉的。读它我总觉得您的散文在精神脉向上很大程度源于魏晋。我不知道您在为人文或审美取向上，有没有受到魏晋文人直接的影响？对魏晋文人有没有过学术上的研究？

周涛：没有。严格说，假如有相同之处，也是某种文化血脉上的相承，它自然就流露出来了。刻意去学未必能学到精髓。它既然已经存在了，今后历史上也不可能从此消失。总有相似的人，相似的生命走类似的道路。但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傅光明：就是说，周某人的气质与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文人遥遥相对。

周涛：有这么点承接关系也可能，是吧。我真正知道魏晋风骨，还是看了鲁迅的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其他的史料没看过，更多一点就是余秋雨写的魏晋的阮籍、嵇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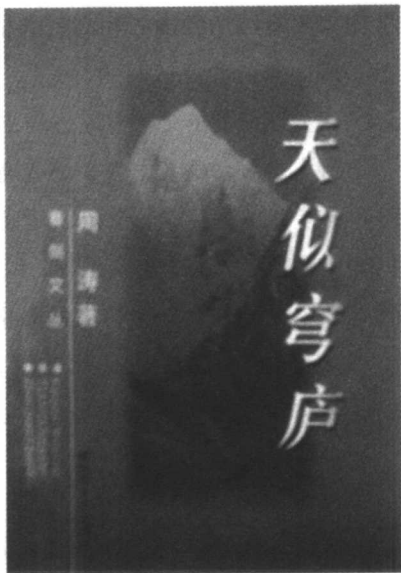
傅光明：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沟通和契合。

周涛：自然而然的，总是要有一些影响。

傅光明：您刚才提到了鲁迅。我读您散文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如果上个世纪百年让您选一位令您折腰的作家，只有鲁迅一个人。鲁迅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对您的影响非常大，在您写作或者为人的精神品格当中，他对您的影响最主要在哪些方面？

周涛：我觉得我几乎没法学习鲁迅。《鲁迅全集》我是经常读的，但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学成他那样的，因为他是不可模仿的。潜移默化的东西肯定是有的，对我来说那种非常理想的状态和高度是不可企及的，正因为不可企及，也就没法模仿。

傅光明：另外，我想鲁迅先生他强调或者自己坚持一点，就是在写作



上作家要有纯洁的内心和高贵的精神。对您是否认同？

周 涛：我是认同的。

傅光明：您在文章中提过的一件小事我印象非常深刻，这让我对作为一个诗人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普通的周涛也好，多了一分敬重。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媒体召开一个诗歌朗诵会，当主持人请您为大家助兴朗诵诗的时候，您勃然大怒，当众拒绝，说我的诗歌不是用来给大众逗乐的。我觉得这反映出您作为一个诗人的品格，您的这种精神力量来自于哪些方面？

周 涛：我内心是不太容忍在这个问题上被人侵犯，在酒桌上朗诵诗，我肯定变脸。这让我非常痛心。

傅光明：他们可能没有恶意。

周 涛：当然更多还是好意，但你不能触犯我。他们没有和我商量，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可能还觉得是表彰我，但我认为这是对我内心深处某种东西的无理侵犯。

傅光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涉及到了大众对诗和诗人的普通心理存在了问题。

周 涛：诗所独有的诗意，只能是独自品尝的，不是拿来共赏的，它不具备表演性。一旦进入表演，就是非诗。所以，我不听诗朗诵。再好的朗诵家朗诵诗，我一听就起鸡皮疙瘩，受不了。我听到过诗朗诵，只有几个朋友在一起，兴致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有朋友借着酒兴朗诵出自己的作品，那股深情，那个好呀！我记得在七十年代，叶文夫有一次给我朗诵过他的诗。我听得热泪盈眶，真好。没人能这么朗诵。

傅光明：您有没有在没有人的时候自己朗诵自己的诗给自己听？

周 涛：没有，我朗诵诗不行。我有时候哼唱歌，唱歌也是没人的时候自己唱，有时还唱得自己挺感动。没听众的时候可以。

傅光明：感动不了别人，感动自己。

周 涛：歌唱家唱才能感动别人。

傅光明：我觉得您的散文好多是写自然的，像《猛禽》、《巩乃斯的马》、《稀世之鸟》等，至少给作为读者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难忘的印象。但似

乎您在写人上稍逊一筹，就是说您与自然的生命对话，是您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的特长。我觉得是不是您对人性的琢磨比同自然的契合沟通，在把握上欠一定的功力火候？

周涛：当然，但差一些不等于没有。我承认差一些，因为我这个人不大琢磨人。

傅光明：是不是人比自然难琢磨？

周涛：难琢磨，复杂。因为我比较简单，可以说为人处事比较喜欢简简单单，有什么事咱们直来直去的。

傅光明：您善于和动物打交道，不善于和万物灵长的人打交道。

周涛：万物灵长的人太聪明了，像我这样的人，脑子比较直，懒得琢磨人，也不太琢磨别人。这还体现出诗性和文性的一个差别，所以有的人是诗人，有的人是小说家，这里有非常大的差别。不但他们的文体，还在于他们的取向。

傅光明：我觉得您写起自然来灵性实足，而一写起人来好像就拙钝了许多。

周涛：诗人吧，关照内心，观察自己，琢磨自己，琢磨自然和动物多。而小说家琢磨社会多，琢磨别人多。当然，他同时也琢磨他自己。因为没有自己的深度也不可能认识社会的深度。这两个有很大的区别，也是散文家和小说家的本质区别，有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一种差别。

傅光明：现在散文界有个说法叫“南余北周”，南方余秋雨，北方周涛，您自己认同这个说法吗？

周涛：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很友好，他的影响肯定比我大得多。余秋雨的《文



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出版了以后，我拜读了，一直到今天，不管别人说好说坏，我是不改初衷。我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学者散文所达到的最高的高度。比如过去有很多学者，学问并不次于余秋雨，像徐志摩、朱自清那批人，都是留洋的，很有学问的，但他们写的散文还是作家散文，不是学者散文。他们并没有把散文和学者的某种长处结合起来。

傅光明：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余秋雨开拓了百年来散文创作的新境界。

周 涛：他是第一人。他的文章写得很长，还很耐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是普及文化的一个学者。有些学者知识多，但没有他这么好的文才，才情。有作家有他这个才情，却没有他这么多的知识。他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

傅光明：我自己对您和余先生的散文区别，有一个小的概括，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同。用玩笑话说就是我的“三性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多地透露出知性、智性和理性，而您的散文透露出的更多是感性、悟性和灵性。我不知道这是否说出了哪怕一点您和余先生在散文写作和为人性情上的一点区别？

周 涛：余秋雨他处的那个城市上海，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他做事情的时候也不像我在新疆，相对而言，有点古典色彩的地方。两个人地域和生活背景的不同，也造成两个人的区别。你这样概括我是同意的，也不知道秋雨是不是同意。怎么说呢，“南余北周”，我是有点愧不敢当。

傅光明：“南余”的书卖得非常好，除了书本身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外，读者好像更喜欢读余秋雨。相对来讲，“北周”在书的销售上远远赶不上余秋雨，在这点上我都有点替您吃醋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余先生是学者，给人感觉有谦谦君子的风度。而您有好多误解您，觉得您好像很张扬，很狂放，整个一魏晋狂士，先让媒体记者畏惧三分，躲得远。如果用“炒作”这个词来说，就是媒体对余先生的“炒作”要远远大于您。您怎么看待真正好作品的畅销、“炒作”及其内在的力量这三者的关系？

周 涛：其实我也是谦谦君子。

傅光明：我的意思没有说您就不谦谦了。

周 涛：我这个人吧，跟你说，光明，我的本质是非常善良的。

傅光明：这我知道。

周 涛：我可能没有好多人有知识，没有好多人聪明，但我决不比谁不善良。张扬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在战略上比较愚蠢，而这种张扬的作风，在某种意义上，毫不设防，直抒胸臆，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自己就说了。说了也不管它造成什么效果，说完就完了，明天自己都忘了。

傅光明：我也因您的张扬，开始时先惧您三分。结果跟您一接触，一读您的散文，读出了侠骨下的柔情万种，大概也就是您说的骨子里的善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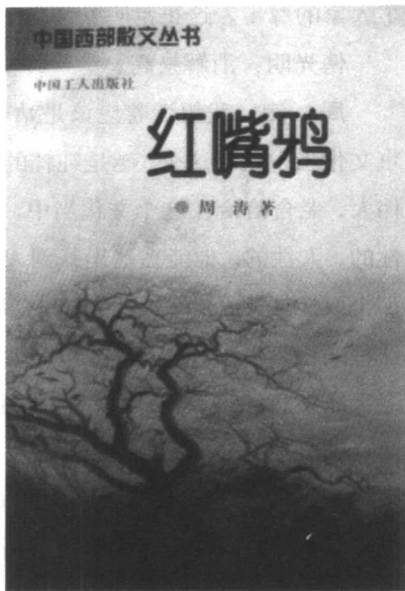
周 涛：对。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和文化的差别，差别就差别在我始终在批判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当中那些腐朽的东西，我是仇恨这个。

傅光明：中国文化的传统对张扬个性的做法本身是不接受的。

周 涛：排斥的。可西方人不这样，西方人一说就是，我是美国最优秀的作家，我是英国第一诗人。其实他第一百都不是。谁给他定的，他就这么认可。

傅光明：可当周涛说他是最好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

周 涛：非常反感。好像触犯了别人。其实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自说自话，我自言自语，我自己给自己打气。这里面的文化差别来自于哪里呢？我周涛作为一汉族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西域文化。西域的文化当中缺少这种假谦虚，而这种假谦虚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中还在相当盛行。贬自己，骂自己。我先躺着，看你还能把我怎么样。最后赢得



了人家的尊重。这正常吗？

傅光明：消解崇高。

周 涛：我想活着应该是站着，是本色的。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北京文化当中就有这个，越是纯粹的北京文化当中越有这个。为什么说老舍伟大，老舍恰恰在这个文化当中，真正贴近了人民。不是奴性文化，是灵性的，人性的。他能在这里找到人性文化，太不简单了。西安文化里就有那个奴性文化，流氓式的文化，变脸的，今天是奴才，一转眼就变成主子。这种文化是中国传统地方文化的压抑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的怪胎，我们直到今天还在津津乐道，还在崇拜那种东西。

傅光明：也就是皇权文化。

周 涛：我不喜欢这个，无论走到哪我都敢说，我永远不做那样的人。

傅光明：看来您对那种“辫子戏”、“清宫戏”一定非常反感。

周 涛：反感。

傅光明：那里总是主子、奴才，喳喳喳。

周 涛：我对演那种什么皇帝、皇城戏有那么大的兴趣，不能理解。光明，我还得说两句，那种文化里面就是能欺负的人往死里欺负，该巴结的人往死里巴结。

傅光明：这是二主子心态。

周 涛：啊！鲁迅骂的就是这种东西，实际上这是一种最流氓的东西，比土匪还坏。生抢楞杀的土匪有时候动了人性，还挺善良的，匪亦有道嘛。但这种东西，已经把人性磨得干干净净了，纯粹剩下一个奴才了。而这种东西，我们在电视上大规模地播演。

傅光明：鲁迅批判的就是这种媚骨奴性十足的民族劣根性，但今天这种东西还在很多场合泛滥、延续。

周 涛：现在演的电视里面，我看《激情燃烧的岁月》是最好的一部片子，真实、亲切，我很感动。没有深刻的体验，决写不出那样的对话来，那样的人物来。石光荣是活生生的一个形象，非常感人，老少都爱看。写这样的题材让青年人爱看可不容易呀。